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朱尖¹

【摘要】：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

【关键词】：东汉初期 边疆经略 南蛮 西南夷 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2）03-0107-09

东汉初期边疆经略呈现出极强的内缩性特征，不再强调战争，对以匈奴和西域为代表的北部边疆问题基本采取消极防守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则采取了较为积极的进攻策略，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这不得不使人深思，为何东汉初期在处理南北边疆问题时，会有如此明显的反差？南部边疆为何能够被如此重视，其特殊在何处？针对这一问题当前学界关注不多，已有的研究多将重心集中在汉光武帝刘秀对北疆，尤其是西域的治理上，¹或者对其民族、边防政策的得失展开评价，²鲜有对这一阶段东汉南部边疆治理的特别关照。基于以上情况，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尝试对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具体对对新朝以后的边疆复杂局势梳理分析入手，将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放在边疆治理的大背景下作比较探讨，进而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地区战略地位提高、南部边疆郡县化特征、南部战争规模等角度，探讨隐藏在其中的特殊性。

一、王莽新朝以来复杂的边疆局势

东汉初期边疆局势极为复杂。新朝建立之后，王莽立即对边疆地区采取了压制措施，他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³可以发现王莽的改王为侯，针对的对象除了“汉氏诸侯”之外，就是边疆的“四夷”。对此，王莽于始建国元年（9）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⁴。王莽的改王为侯及其后续措施，引发了边疆巨大震动。

北疆方面，王莽“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⁵。由于新印文的变化，使得匈奴单于于不悦，由此结怨。后来王莽进一步分化匈奴，使双方矛盾公开化。王莽则“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并指出“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⁶，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进而匈奴方面“数为边寇，杀将率吏士，略人民，驱畜产去甚众”，作为回应王莽“会诸蛮夷，斩咸子登于长安市”⁷。同时，向北部边疆大规模屯兵，“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身之身。……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⁸，欲一举歼灭匈奴。由于数年“久屯不攻”，导致边境地

¹作者简介：朱尖，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边疆史、东北民族史和中国边疆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东北边疆古史谱系研究及数字人文平台建设”（项目号：21VJXT007）；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汉代治边思想史资料整理与初步研究”（项目号：2022YQNQD020）的阶段性成果

区出现“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空虚，野有暴骨矣”⁹的局面。

西域方面，王莽改了单于玺为章，导致单于怨恨，引发了匈奴对本臣服新朝的西域展开动作。史载：“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狐兰支降，遣兵与共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¹⁰由于当时戊己校尉刀护生病，便“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史终带取粮食，司马丞韩玄领诸壁，右曲候任商领诸垒，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将人众降匈奴’”¹¹。可以看出西域的状况较为麻烦，问题不仅仅局限在西域诸国反叛，已经波及新朝在西域的边吏，这些边吏为了自保，甚至要投降匈奴，并最终杀害戊己校尉刀护。此为王莽所不容，匈奴乌累单于上任，与新朝关系缓和，王莽借此赂单于，购求此前反叛的西域边吏陈良、终带等，并将一众人烧杀。后来，王莽再次欺诈骗单于，双方关系再度恶化，使得“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¹²。尽管在天凤三年（16），王莽“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但西域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焉耆诈降，聚兵自备。在这种情况下，“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¹³。可以看出，西域诸国表面受新朝边吏的统领，但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反间”，最终“西域因绝”。

西南方面，史料明确记载了王莽改王为侯过程中西南夷的反叛情况。史载：“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¹⁴杀句町王邯引发了其弟的不满起兵攻杀歆，同时“三边夷悉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于是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¹⁵。但经过三年的征讨，并未取得胜利，反而使得将士因疾疫死了大半，造成巴、蜀一带骚动。王莽再次“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¹⁶。但结果并不理想，“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嵩夷吏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¹⁷。

东北方面，尽管王莽改王为侯，史料中也没有东北边疆反叛的记载，但是在王莽屯兵征讨匈奴的过程中，乌桓、高句丽出现了问题，并最终进一步演化为更严重的叛乱。乌桓方面，史载：“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叛，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¹⁸高句丽方面，史载：“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驩，……尤诱高句骊侯驩至而斩焉，传首长安。”高句丽侯驩被杀，王莽遂“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使得“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¹⁹。

由于系列内外政策的强力推行，加之王莽不听劝谏、操之过急，最终导致新朝短命而亡，西汉对边疆所建立的藩属体系最终土崩瓦解。更为糟糕的是，新朝的灭亡并没有改变边疆的混乱局面，当时边疆的郡县与边疆民族政权相互勾结，形成了多个割据势力，对新生的东汉政权造成巨大威胁。北部在玄汉更始二年（24）冬，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玄汉试图恢复与匈奴如西汉时的藩属关系，但是遭到了匈奴单于的拒绝和羞辱。单于回复玄汉使者指出：“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²⁰这表达出了匈奴单于欲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玄汉臣服于其的藩属体系的期望。随后匈奴扶植卢芳势力，并要求其“令尊事我”²¹。此外，匈奴还通过和亲等方式，让北部边郡的五原、朔方、代郡等地方势力去拥立卢芳，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西部在刘秀即位河北之时，隗嚣试图劝说更始帝归于光武帝，为更始所不容，于是勒兵自守，后来在更始朝的围剿下亡归天水，“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²²，在西部地区形成割据势力。西南公孙述割据势力，史书记载：“自更始败后，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关中豪桀吕鲈等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皆拜为将军。遂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使将军李育、程乌将数万众出陈仓，与吕鲈徇三辅。三年，征西将军冯异击鲈、育于陈仓，大败之，鲈、育奔汉中。”²³可以看出，公孙述在益州势力极为强大，公然与东汉展开对抗，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公孙述能够在建武元年（25）自立为天子，号成家，并建元龙兴。公孙述势力的强大一度波及隗嚣，先是以宗主的身份赐予隗嚣扶安王印绶，对此隗嚣极为恼火，未许。到了建武六年（30），隗嚣与东汉关系恶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接受了公孙述的册封。

面对如此复杂的边疆局势，东汉所采取的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对于不同区域又有侧重。先是，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为了实现政权稳固，自东汉建武元年（25）十月至建武十二年（36）十一月，汉光武帝对包括边疆割据势力在内的，关东、关中、陇右、蜀中等地的割据势力进行平灭，实现了初步统一。此后，汉光武帝立即放缓了战争步伐，边疆经略表现出了极强的内缩性特征。此时，汉光武帝打算“偃干戈，修文德”²⁴，对于边疆事务反复提出“未遑外事”²⁵。具体而言，针对西域诸国的多次请都护，最终汉光武帝刘秀在建武二十二年（46）回复鄯善王的上书中指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²⁶这使得西域的鄯善、车师倒向匈奴。针对北疆匈奴方面，尽管在建武二十四年（48）出现了匈奴分裂的绝好时机，面对郎陵侯臧宫和扬虚侯马武上书征讨北匈奴的建议，汉光武帝却表现出“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²⁷的消极态度。针对位于东北边疆的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等的侵扰和寇钞，东汉则多“恩信招之”，采取羁縻治理。整体上看，东汉初大约自建武十三年至建武二十七年 15 年的时间里，处理北部地区的西域诸国、北疆匈奴和东北边疆诸族问题时，尽管在少数时候出现过积极态度或出兵征讨，但基本策略还是停止战争、以德治边的消极政策。而与此同时，东汉在处理南部地区的南蛮、西南夷时，则表现得完全相反，南部边疆经略在东汉初期的边疆治理中显得尤为特殊。

二、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表现与特点

通过前文关于新莽以来边疆局势复杂性的梳理和分析，对于东汉而言，如何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是极为关键的。

南蛮方面。史书记载：“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²⁸从这条史料看，在东汉建立初期，边吏锡光、任延勤政爱民，指导当地民众农业耕种、媒娉姻娶、建立学校，传播汉代的农业生产和文化礼仪，南部边疆相对稳定。由于东汉积极经营，对当地周边部族产生了积极影响，“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²⁹。但是四年以后的建武十六年（40），这种和谐的局面被打破，“至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³⁰。交趾二征的反叛，不仅攻破郡治，而且波及范围较广，当时南部多个郡的蛮夷都积极相应。面对这一情况，东汉光武帝“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为征讨南蛮反叛作战前物资准备，并于建武十八年（42）夏四月，“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³¹。这一情况，在《后汉书·马援传》中亦有记载：“又交趾女子征侧及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³²该史料尽管在征侧“妹”和斩杀征侧、征贰时间等细节处与《南蛮传》记载有细微差别，但整体事件内容是一致的，且后者记载更为详细。马援征讨南蛮并不仅仅局限于打赢战争，还对南蛮地区进行了积极的经营。史载：“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封溪、望海二县，许之。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³³马援作为东汉著名将领，此前在陇西抚平西部羌乱有功，被征入朝任虎贲中郎将，可以说经验丰富、战功赫赫。入朝之后仅一年马援便被委以平叛重任，取得了巨大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马援将征讨之地进一步强化管理，积极发展经济、推广制度文化，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建武二十三年（47），南蛮地区又出现了武陵蛮夷的反叛，史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³⁴对此，东汉立即“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由于刘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³⁵建武二十四年（48）武陵蛮夷相单程等进一步进攻边郡，“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对此，东汉再次遣经验丰富的马援带兵出征，史载：“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³⁶马援的出征，依然所向披靡，战争取得胜利，对于武陵蛮夷“置吏司”进行直接管理。与此同时，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湄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东汉亦立即“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

也”。³⁷

西南夷方面。史料记载建武十八年（42），“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檣榆、桥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³⁸。次年，东汉便“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建武二十年（44）刘尚大军“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建武二十一年（45）正月，刘尚大军“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³⁹就在刘尚大军征讨益州蛮夷时，“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巂。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⁴⁰史料中的长贵本是西南夷邛人，王莽时期西南郡守枚根曾调遣长贵为军侯，更始二年（24），趁乱长贵杀了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后来投降公孙述，光武帝平灭公孙述后，汉光武帝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38）授予长贵越巂太守印绶。刘尚得知长贵有异心后，果断采取措施，对长贵进行诛杀，并徙其家属于成都。除了出兵征讨之外，东汉初对于南部地区内属蛮夷，也是积极接纳。史载建武二十七年（51），哀牢王“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⁴¹

东汉初期在完成局部统一之后，边疆经略突出地表现出两面性特征，即北部消极、南部积极。为了更为清楚地比较东汉初期边疆经略的两面性，笔者大致梳理了建武十三年至二十七年东汉处理不同区域边疆问题采取的政策与态度情况（见下表）。

表建武十三年至二十七年东汉处理不同区域边疆问题采取的政策与态度

时间	边疆事件	东汉政策	东汉态度	边疆地区
建武十三年（37）	匈奴寇河东	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	消极	北部
建武十三年（37）	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边	汉修飞狐道防守	消极	北部
建武十四年（38）	西域请求复置都护	刘秀未许	消极	西域
建武十五年（39）				
建武十六年（40）	交趾女征侧怨怒、征侧反。	马援南击交地，大败征侧，斩杀征侧、征貳	积极	南部
建武十七年（41）				
建武十九年（43）				
建武十七年（41）	莎车王贤再次遣使请都护	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又收回，出尔反尔	消极	西域
建武十九年（43）	邛谷王长贵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	诛西南夷邛谷王长贵，徙其家属于成都	积极	西南
建武二十年（44）	匈奴对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	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	消极	北部

二十一年（45）	山等郡县侵扰，北边无复宁岁				
建武二十一年（45）	西域的车师、都善、焉耆等十八国遣子入侍，请都护	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并厚赏	消极	西域	
建武十八年（41）		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	积极	西南	
建武十九年（43）	夷渠帅栋蚕与姑复、牂榆、梯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				
建武二十一年（45）		斩西南夷栋蚕帅			
建武二十二年（46）	莎车进攻都善、都善王上书更请都护	刘秀回复：“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	消极	西域	
建武二十三年（47）	南郡澹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	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	积极	南部	
建武二十三年（47）					
建武二十四年（48）	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	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征讨，二十五年击破	积极	南部	
建武二十五年（49）					
建武二十五年（49）	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	祭彤以“恩信招之”	消极	北部	
建武二十七年（51）	匈奴分裂后，臧宫和马武联合上书出兵北匈奴	刘秀回复“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	消极	北部	
建武二十七年（51）	哀牢王贤栗等遂率种求内属	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	积极	南部	

从以上东汉对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行动可以看出以下特点：首先，涉及的蛮夷种类较多，其中南蛮有交趾征氏、武陵蛮、潯山蛮等；西南夷有栋蚕、姑复、牂榆、梯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等诸种，以及邛人、哀牢人等。其次，东汉态度坚决、处理果断，对于南蛮和西南夷的反叛，东汉朝堂基本没有争议，都是立即采取措施，派经验丰富的将领带兵，集结具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征讨，目的就是必须取得胜利。再次，时间相对集中与北疆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的南部边疆经略主要发生在约建武十二、十三年到建武二十七年的十余年时间里，与对西域和匈奴消极政策时间基本重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对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特殊性的认识

为何东汉初期对南部边疆如此重视，而对北疆问题的处理却十分消极？关于这一问题，学界直接关注不多，有个别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提供了一些线索。比如，王子今在分析马援远征交趾、九真时，指出：“与刘秀建武时代在西北方向的收缩政策相对应，汉王朝在东南方向却调动‘大兵’积极进取。汉光武帝发起了对交趾、九真的远征。两个方向的政策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平定交趾、九真不被看作‘外事’，应当与当地已经置郡有关。而东南方向的区域经济形势也应当注意。”⁴²李东红、陈丽媛从“滇国三印”探讨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时，也指出：“印章文物与史料记载相得益彰，共证西汉王朝对滇王、滇国、益州

郡的管辖与设治,既不同于内地,亦有别于其他‘藩邦’,具有鲜明的西南边疆区域特色。……益州郡建立之后,‘滇国’仍然存在,而且像内地诸侯王国一样,有一套行政系统,……益州郡设立与汉代西南边疆历史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特征。”⁴³ 尽管李东红、陈丽媛关注的是西汉的西南边疆治理,显然东汉对其有继承性。笔者以为,东汉初期的南部边疆已经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同时南部边疆也是传统意义的郡县范畴,该地的蛮夷叛乱属于郡县内部,不是统治者“未遑外事”中的“外事”。另外,南部边疆问题相较而言战争规模较小,不会动摇东汉政权的根本。

第一,两汉之际的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南部地区战略地位提高,使得统治者较为重视南部地区。关于人口南迁,以往的研究多重视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社会动乱导致的人口大迁徙,实则在两汉之际人口南迁已经开始。葛剑雄指出由于中原地区长期都是政治中心所在,争夺政权和异族入侵都以此为目标,经常沦为大规模的战场,陷于长期混乱。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会有大量人口迁往江淮之间、四川盆地、长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也有一些迁往北方较安定的边疆地区。这类移民不仅数量大,迁移时间和地点集中,而且包括大批贵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艺人、工匠、商人、武士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艺或行政治理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因而对南方及其他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这类迁移从西汉末年年开始,在东汉末年、三国初、西晋末至南朝初、隋末、唐代中后期、五代、北宋末南宋初、金末元初都曾发生过。⁴⁴ 在两汉之际的人口南迁问题有两个重要方向,其一是往岭南地区迁徙,其二则是西南地区的四川盆地和云南一带。关于这一时期人口南迁史料记载不是十分清楚,但依然可以洞察相关信息,此外考古资料亦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后汉书·循吏列传》载:“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⁴⁵ 这一记载时间发生在更始元年(23),也就是说这些避乱江南者移民时间是在新朝动乱时期。此外,东汉初期的发展战略中也能洞察南部的重要性。根据王子今的研究,考察丝绸之路史,可以发现草原丝路在“西北”方向,海洋丝路在“东南”方向,分别实现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东南”和“西北”两个重心正与西汉扬雄所谓“东南一尉”“西北一侯”相对应。两汉之际移民南下,江南的开发呈现新的形势,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对外交通南洋航道的繁荣,也使得东南外向发展的战略路径受到重视。⁴⁶ 在西南方向,由于关中地区成为战争的中心,受到严重破坏,流民向南部富庶的四川盆地和云南地区流散。在西南夷广大地区发现的大量汉墓证实了汉人的存在并揭示了他们分布的情况,考古发现在四川西部和云南大部分布了大量汉墓,这些墓葬形式和随葬品与内地的汉墓基本相同,并且还出土了具有汉族姓氏的铜印章等文物。将这些汉墓出土的地点连接起来看,就会发现当时的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西南夷道和西夷道沿线及附近的平坝地区。⁴⁷ 尽管西南地区的汉墓年代不能明确一定是在两汉之际,但是可以肯定这一时期存在较大规模的关中人口南迁情况。人口的大量南迁和统治者的重视,使得南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战略地位凸显。傅筑夫认为自两汉之际后,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⁴⁸

第二,南部边疆地区属于传统的郡县范围,地区蛮夷叛乱属于郡县内部事务,东汉处理这些事务时,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毋庸置疑,自秦朝建立统一政权,并实行郡县制开始,南部地区就是传统的郡县范围。在南部地区,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定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九江等三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继续向南开拓,增桂林等三郡,次年设闽中郡,秦的东南边疆已达东海、南海。⁴⁹ 在西南地区,秦统一后在西南设有蜀郡、巴郡、黔中郡,为了通滇池,“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⁵⁰,统一滇池地区,强化管理。秦朝南部地区的郡县设置,到了西汉得以进一步巩固、拓展。西汉时期,南部地区,元鼎六年(前115)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⁵¹。西南地区,西汉建立前就领有巴、蜀之地,助刘邦建立统一大业。元封二年(前109)滇王举国投降,以其地纳入益州郡,西汉西南边疆连成一片。可以看出,秦、西汉对南部地区有清晰的治理轨迹,而且是明确将这一区域纳入到郡县的直接管辖范围。到了东汉时期,秦、西汉对南部地区的郡县管理体制得以延续。对于东汉而言自然不会将这些郡县及其周边的蛮夷势力作为“外事”处理。这与匈奴、西域、乌桓、鲜卑这些藩属有所不同。根据上文的梳理,南蛮交阯征氏的反叛是在交阯郡内、南郡潯山蛮雷迁等反叛是在南部郡县内;西南夷邛人长贵本就是越巂郡太守、夷渠帅栋蚕等诸种反叛是在益州郡内。东汉在处理这些反叛过程中,有些细节问题也能反证当时统治者是有将这些边疆事务纳入郡县管理的意识。如南部在征讨二征反叛过程中,马援上奏将边远且人口众多的西于县进行细化管理,将其分为封溪、望海二县,对武陵蛮夷则“置吏司”进行直接管理,平灭潯山蛮雷迁等反叛后则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郡县界中;西南方面一些“夷君”就“领太守事”,对自西汉沿袭下来的管理体制本身就具有特殊性,有学者研究

指出在西汉以益州郡、牂牁郡、越巂郡为主的西南夷郡县，其“流官”系统中的不少长、令、尉都由当地“夷君”担任。^{5•2}这一特殊的管理体制，将以夷制夷和因俗而治的思想纳入了郡县管理体制之中。后来，汉明帝在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⁵³。东汉统治者在处理南部和西南地区的边疆问题时，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边疆问题似乎都被认为是郡县内部事务。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东汉自然不会将南部边疆事务作为“外事”对待。

第三，南部边疆战争规模都相对较小，不会伤及东汉根本。前文已述，无论是马援在南部的用兵还是西南夷地区的战事，尽管史料中出现“兵万余人，将万余人”，“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等记载，可知战争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是与北部匈奴战争动辄数十万将士，时间持续数十年作横向比较，显然南部的战事都是较小规模的，不会伤及东汉的根本。并且为了稳妥起见，东汉基本都是派遣拥有丰富经验的将军带兵征讨，或者发动区域多个郡县合力出击，在绝对优势下确保胜利。

综上所述，东汉政权建立初期，面对王莽新朝以来的复杂局势，对边疆问题采取了相对消极的治理政策，将精力集中在内部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上。但是，这一过程中东汉对南部边疆的南蛮和西南夷采取了积极的治理手段，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问题特殊对待，有着深层的原因：一方面，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南部边疆属于传统的郡县范畴，东汉初期的南部边疆战略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南部边疆战略付出的代价也相对较低。需要说明的是，东汉在这一时期对北部边疆的消极态度，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或放任北部，其中隐藏着东汉统治者的边疆治理策略和智慧。对于此，笔者将另文从东汉前期边疆战略的更长时段和更广视阈展开详细探讨。

注释：

1 张京华：《汉光武帝对西域属国的政策》，《理论学刊》1988年第5期；曹旭东：《东汉初年西北边郡的省并与徙吏民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辑；陈金凤、张丽君：《汉光武帝西域政策探微》，《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赵国华：《论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梁安和、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2020》，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7-55页。

2 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陈金凤：《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

3(1)（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5页。

4(2)（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4115页。

5(3)（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3820页。

6(4)（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4125页。

7(5)（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3826页。

8(6)（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4121页。

9(7)（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3826页。

10(8)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第 3926 页。

11(9)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 第 3926 页。

12(10)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 第 3927 页。

13(11)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 第 3927 页。

14(12)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9 中《王莽传》, 第 4130 页。

15(1)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5《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第 3846 页。

16(2)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5《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 第 3846 页。

17(3)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5《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 第 3846 页。

18(4)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90《乌桓鲜卑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2891 页。

19(5)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9 中《王莽传》, 第 4130 页。

20(6)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9《南匈奴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2940 页。

21(7)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20《王刘张李彭卢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506 页。

22(8)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13《隗嚣公孙述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521 页。

23(9)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13《隗嚣公孙述列传》, 第 537 页。

24(1)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17《贾复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667 页。

25(2) 汉光武帝完成对割据势力的平灭之后, 在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多次强调“未遑外事”。《后汉书》卷 1 下《光武帝本纪》载:“帝以中国初定, 未遑外事, 乃还其侍子, 厚加赏赐。”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73 页;《后汉书》卷 47《班超传》载:“光武中兴, 未遑外事, 故匈奴负疆, 驱率诸国。”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1587 页;《后汉书》卷 88《西域传》载:“光武以天下初定, 未遑外事, 竟不许之。”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2909 页;《后汉书》卷 89《南匈奴传》载:“光武初, 方平诸夏, 未遑外事。”第 2940 页。

26(3) (东汉) 班固:《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 第 2924 页。

27(4)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18《臧宫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696 页。

28(5)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2836 页。

29(6)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 第 2836 页。

-
- 30(7)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36 页。
- 31(8)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36-2837 页。
- 32(1)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839 页。
- 33(2)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24《马援传》,第 839 页。
- 34(3)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31 页。
- 35(4)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32 页。
- 36(5)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32 页。
- 37(6)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1 页。
- 38(7)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6 页。
- 39(8)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7 页。
- 40(9)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53 页。
- 41(10)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9 页。
- 42(1) 王子今:《论“西北一侯”: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西域研究》2021 年第 1 期。
- 43(2) 李东红、陈丽媛:《从“滇国三印”看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 年第 3 期。
- 44(3)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418-419 页。
- 45(4)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76《循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640 页。
- 46(5) 王子今:《论“西北一侯”: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
- 47(1) 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上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64 页。
- 48(2)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5 页。
- 49(3)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5 页。
- 50(4) (汉) 司马迁:《史记》卷 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993 页。
- 51(5) (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3859 页。

52(6)李东红、陈丽媛：《从“滇国三印”看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

53(7)（刘宋）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9 页。